

《江上诗钞》之编纂与刊印

吴 格

《江上诗钞》一百七十五卷，《江上诗钞补》十一卷，清咸丰间江阴顾季慈辑，民国初江阴谢鼎镛补辑，民国二十至二十二年（1931-1933）江阴陶社木活字印本。十一行二十二字，白口四周单边单黑鱼尾，版匡18.5×13厘米。

《江上诗钞》及其补编、续编，是一部全面纪录自唐宋以迄民国初历代江阴籍诗人作品之总集，始辑于清咸丰年间，补辑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刊印于“一·二八”抗战烽火中，成书至今，已逾七十寒暑。由于内容丰富（含一千余位诗人之二万余首诗歌），卷帙浩繁（约三千二百叶、订为四十四册），刊印校对，工巨事繁，而所需经费，均赖地方士绅自筹，终始其事者为民间诗社陶社成员，成事极为不易。由于采用木活字印刷，印数原本有限，书成拆版，遂无重印可能。且印制于动荡年代，书成未久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江南地区饱受蹂躏，民生维艰，故其书销路不畅，未能流行于通都大邑。据初步调查，目前国内仅少数图书馆尚藏有此书（国家图书馆藏有两部以上完整的《江上诗钞》及《江上诗钞补》活字印本，还收藏有谢鼎镛《江上诗钞续》稿本）。兹因江阴地方重印《江上诗钞》之役，略述此书内容及编纂刊印原委如次。

一、《江上诗钞》之编纂

江阴是长江下游近海之历史文化名城,地处大江之南,历史上战乱频仍,虽使江阴屡遭生灵涂炭,而当地人民重视文化教育、勤于积累文献之传统,并未因此而衰落。清代自雍正十三年(1735)始,江苏学政驻节江阴,每岁于此考察大江南北生员,遂使非省治、府治所在之江阴,于科举文化方面占有特殊地位。清光绪八年(1882),江苏学政黄体芳于江阴创办南菁书院,培植朴学人才,稍后王先谦于学政任内,创办南菁印书局,刊印《南菁书院丛书》、《清经解续编》等重要典籍,尤使江阴地方人文蔚起,著述称盛。流风所及,邑人夙以乡邦文献之搜罗保存为要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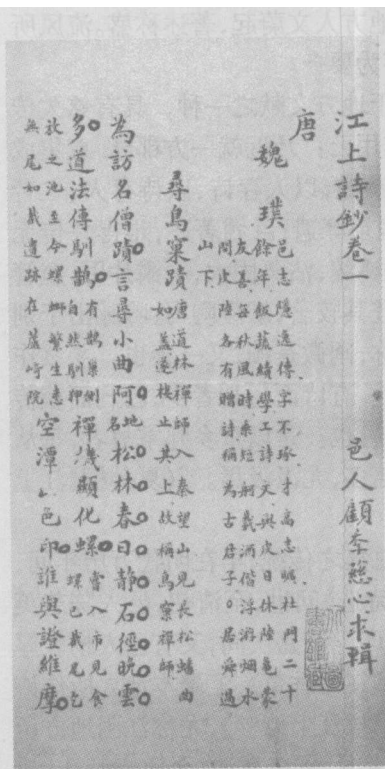
地方性诗歌总集之编纂,属于地方文献之一种,具有悠久传统,民国间江阴学者夏孙桐论其作用云:“乃近就一方郡邑,哀集成编,于以著耆旧之风流,表桑梓之恭敬,以人存诗,以诗存人,二者兼取,盖有数善:名臣言行,未必编录靡遗;巨儒著述,难得并传无佚。往往篇章寓意,譬欵如亲,巨帙鸿编,沾溉固大,一鳞片甲,窥管知全,斯一善也。乡里雅流,方志登其较著;烟霞陶写,吟咏出于别才。枫江断句,空谷遗音,片善可称,闾微是赖,又一善也。斐然作者,剞劂或艰;蕞尔孤缣,覆瓿偏易。有诗而付刊者少,已刊而获传者少,惟有汇编,流传始久,又善之善也。是以重乡邦掌故者,每从事于文钞、诗钞之役,而诗之存人倍多,尤汲汲焉。”(夏孙桐《江上诗钞序》)

江阴人士夙有编纂地方诗歌总集之传统,早在明代万历年间,即有许学夷、丘维贤同编之《澄江诗选》问世,至清初,邑人陈芝英又曾编纂《江阴诗粹》,两书均经刊印。清嘉庆间,又有邑人杨敦厚编《江阴诗存》,著名学者李兆洛编《江干香草》,汇聚本地人所作诗歌。至咸丰年间顾季慈(字心求)编纂《江上诗钞》,尤称江阴地方历代诗人作品集大成之作,“承前人诸编,下迄有清,至道光朝止,成

书一百七十六卷，凡八百五十九家，为诗一万七千首，搜罗所及，蔚为壮观。未几东南寇乱，江左沦陷，烽燹所及，文物凋残，独赖此编存其百一，不可谓非大幸也。”（夏孙桐《江上诗钞序》）《江上诗钞》所辑邑人诗作，起于唐代，迄于清道光末年，存诗一万七千余首，数量远远超过同类之地方诗歌总集，足见江阴地方诗风之盛、诗人之众。顾氏稿本前有咸丰八年（1858）“督学使者临川李联琇”所撰序言，可知此书编成后曾送呈江苏学政审阅。顾氏此书虽于地方文献之保存意义重大，终因卷帙浩繁，绌于财力，生前未能刊布，除曾经

门生唐守礼（切斋）钞录副本外，稿本一直收藏于家。至民国初年，始有钞本数部流传人间。江阴籍学者缪荃孙、金武祥及夏孙桐等，均曾议及校订刊印事。

顾氏《江上诗钞》之编纂体例，见于书前《凡例》，其编选特色如下：一，“汇聚众本”，所编采录了《澄江诗选》、《江阴诗粹》、《邱氏交游翰墨》、《涉江诗社录》、《片玉集》、《琼屑检存》、《江阴诗存》、《旧言集》、《江干香草》、《江阴文献录》、《八影唱和集》等前人所编地方诗歌总集，并参考了各家诗文专集；二，“以人系诗”，按年排列，而不用诗歌分体之法；三，“详远略近”，对于元明以前诗人作品，“吉光片羽，收录无遗”，明



国家图书馆藏《江上诗钞》抄本

清人作品，则选录较严；四，“选录结合”，入选人诗集已亡者，作品悉依前人选本过录，诗集尚存者，选诗或出己意；五，“附载小传”，入选诗人，或据国史，或据方志，撰为人物小传，以便阐幽表微；六，“附录闺秀”，入选部分妇女作品，“巾帼之才，亦足表江山之秀也”；七，不录生存之人诗，“其人现存者，诗虽佳弗录，一遵成例，恐徇情者也；八，“以人存诗”，“以事存诗”，“诗不甚佳，而其人足为表率者，则诗以人存；或其事足以风世者，则诗以事存，明眼人当分别观之。”（顾季慈《江上诗钞凡例》）

顾氏《江上诗钞》稿本，经检各馆书目，未见著录。国家图书馆藏抄本一种，著录为“一百七十三卷，目录一卷”，由该馆同时藏有《江上诗钞续》稿本及谢鼎镛著述多种推测，该抄本应属谢氏校刊《江上诗钞》时所用底本。

二、《江上诗钞》之补辑

《江上诗钞》编纂于咸丰年间，稿本完成以后，顾氏又曾补辑部分咸丰朝诗人之诗。咸同至清末数十年间邑人诗作，则未及补辑。至民国初年，邑人谢鼎镛始起而增补。

谢鼎镛（1878—1960），字幼陶，号冶盦，清末曾肄业南菁书院，自幼笃嗜诗歌，长于吟咏。中年任职四方，所到之处，遍阅书肆及图书馆，锐意搜集江阴人士著述。先后辑刻《陶社丛书》、《江阴先哲遗书》等地方文献多种，《江上诗钞》之补编及续编，为其对于江阴地方文献之又一贡献。“《诗钞》何以有补？以顾氏原书之失选也。原书何以失选？以吾邑地界辽阔，人才众多，而耳目或有所不及也。谢子冶盦留心掌故，自幼即以博闻强识为乐。比长绩学劬书，著述宏富，而于地方文献尤恣意搜采，不遗余力。自南菁辍学后，宦游闽赣苏浙诸省，先后凡十余年，辙迹所经，凡山川名胜，靡不流连光景，发摭论说，撰叙佳胜。或因寄所托，形诸歌咏，而所尤关心者，则在书肆或图书馆，从公之暇，必往观焉。若纸版之考校也，若文字之辨

正也,固一一详审而评隲之,间有关于吾邑文献,或宦游政绩,或流寓珍闻,或骚人诗酒之倡酬,或才人伉俪之赠答,以至荒祠古刹,断碑残碣,破笥旧帙,零缣碎锦,靡不周咨博览。偶有一得,珍同瓌宝,积之既久,裒然成书。”(祝廷华《江上诗钞补序》)

谢氏积三十年之力搜集乡邦文献,初未编纂成书。民国二十年(1931)谢氏家居,适逢陶社刊印《江上诗钞》之役,受聘任全书总校,遂赖多年积累,同时从事《江上诗钞》之补编及续编。“岁辛未,中东役起,冶盦家居,适祝吏部丹卿、钱茂才翰五汲汲焉有刻顾选《江上诗钞》之议,冶盦力任校雠。二君鸠赀经始,板初侵,冶盦有言曰:吾邑诗人,宁止于是哉?溯清初自江上七子结友声社以来,李养一大师曾选《江干香草》八十家。于时诗学盛兴,顾先生心求生丁其际,乃搜采唐宋以下诗,迄道咸朝止,都凡八百五十九家、一万七千首,甄录而手钞之。又仿元遗山《中州集》体例,人列一小传,俾不失以诗存人及以人存诗之本旨,意至美也。……诚以一时一地,吾人之耳目为有限,异时异地,众人之采摭实无穷也。吾踵顾先生后,断代为限,凡列咸丰前者,悉入此编,列咸丰后者,则另入续编。庶几灿然画然,无沧海遗珠之憾云尔。冶盦之言如此,其皇皇于举世不为之日,并役役于烽火交迫之区,可佩也。”(章钟祚《江上诗钞补序》)

谢氏对于《江上诗钞》之增补工作,分为“补编”与“续编”两部分。“补编”是增补顾氏原编所未收之清咸丰朝以前江阴人诗作,谢氏自述其体例如下:

一、是编体例悉本顾氏正编,但于其搜罗所未及者搜罗之而已,故名之曰《江上诗钞补》。

一、顾氏正编虽成于咸丰八年,然脱稿后仍时有增加,今观顾氏稿本可见,故是编断代以咸丰朝为限,凡歿于咸丰前者入补编,歿于咸丰后者入续编。

一、正编不录“方外”,谓其人已出伦常之外,何取其言。然鄙意

昌黎订交不拒大颠,欧阳论诗独推秘演,方外之诗亦不妨存之,故另辑“方外”诗一卷,非敢与原辑故有所同异也。

一、是编叙次,意在矜慎,故有科名者以科名为准,有谱牒者以谱牒为准,若并二者无之,则约计其时,附之于各卷之末。

一、正编“闺秀”附载徐翩翩、洪梦梨之名而无其诗,是编则物色得之,故仍列入,当不嫌其复查也。

一、朱竹垞《明诗综》每于诗家小传后附以诗话,兹略仿之。

一、诗钞与诗选不同,选诗取其严,钞诗取其备,况是编志在补辑,苟有可存,虽零章断句,亦珍同拱璧,阅者幸勿以选诗之眼光视之。

谢氏增补《江上诗钞》,曾遍检《全唐诗》、《江阴县志》、《江阴县续志》、《江苏诗徵》、《澄江诗选后集》、《江阴诗萃》、《舆地纪胜》、《珊瑚木难》、《明诗综》、《静志居诗话》、《妇人集》、《公余日录》、《雪樵诗话》、《缪氏旧德集》、《张氏吉光集》、《闺秀正始集》、《续闺秀正始集》、《闺秀正始再续集》、《杨舍堡城志》、《粟香随笔》、《八影倡和诗集》、《龙砂诗存》、《瑶池冰雪录》、《餐樱庑随笔》、《秦淮闻见录》、《梦花杂志》及各家诗文集,采摭宏富,用力甚勤。

谢氏热心乡邦文献之辑存,以个人之力完成《江上诗钞》之补编与续编,其贡献与咸丰年间编纂《江上诗钞》之顾季慈相埒,足称江阴地方文献征存之功臣。谢氏友人唐鸣凤《江上诗钞补序》云:“《江上诗钞补》者,谢子冶盦补顾子心求所辑《江上诗钞》之所遗也。顾子辑《江上诗钞》,上溯唐宋元明,下讫有清道咸,吾江千百年诗人之流风余韵,灿然大备,固极不世之功矣。而谢子尤能穷搜冥索,使沉沦不显之沧海遗珠,均得以吉光片羽传其名于后世。谢子所补,非特补其诗,补其人也,其功较顾子为尤不可及也。”

祝廷华《江上诗钞补序》曾记载《江上诗钞》刊印期间谢氏一则动人故事:“客岁东倭肇衅,淞沪战祸蔓延长江,吾邑地处要塞,势尤危殆。冶盦不以室家为念,而戚戚于《诗钞》之寄顿。时众议以江

北一带较为宁静，乃将原书络绎运北。迨消息日恶，冶盦手携双篋，挈眷渡江。比登舟时，稍一不慎，失足坠水。黑夜茫茫，江涛汹涌，存亡之机，间不容发。冶盦于风涛中，高擎双篋待救。令弟少卿见兄危状，奋跃入水，互相抱持，冶盦得不死，而《诗钞》亦因以保存。冶盦出险后，急启篋视书，则顾氏原书已湿两帙，而《诗钞补》及《续选》数册则赫然无恙焉。呜呼噫嘻，是书也，固天地鬼神所式凭者也。是书无冶盦不传，则冶盦之不死，又天地鬼神所呵护者也。”

《江上诗钞补》十一卷，计录诗一百六十九家，与《江上诗钞》先后付印。《江上诗钞》之“续编”，谢氏计划辑录咸丰朝至清末之江阴人诗作。现据《江上诗钞》正编、补编之各家序跋所述，知此项工作已大致完成而未及刊印。谢氏《江上诗钞续》稿本，今已于北京国家图书馆访得。

三、《江上诗钞》之刊印

《江上诗钞》之刊印，于民国二十年（1931）由江阴陶社发起。陶社为二十年代江阴地方士人组织之诗社，主持人为社长祝廷华（字毅丞）。民国十九年（1930），祝氏自顾氏后人处购得《江上诗钞》稿本，遂倡议由陶社刊印其书，“先是庚午春季，同人感世变之日亟，叹风俗之日敝，思有以补救之，而苦无长策。余谓陶社成立已久，诗酒之乐，渐亦疏懒，吾侪设社初意，既以正人心、维风教为职志，则刊订遗集，表章前哲，亦近日切要之图，而刊印《江上诗钞》一书，尤至急焉。同人金以为然。咸询费从何出，且谓如此巨集，非万金不克济事，万一力不能济，事将若何？余曰然，然天下事不办则已，办则必求其成，兹事余已筹之熟矣，自曩岁走访顾君骧瑶，商得同意，愿以乃祖心求先生原稿付梓，后又以唐君切斋所钞副本交廷华，欣喜过望，穷日夜之力观之，旬余始竟。自得书后，日游扬于亲故间。钱君翰五慨然允诺，谓余家与顾氏三代师门，兹事果拟实行，筹款之事，敢不惟命。所虑者全书付刊，旷日持久，孰任全责，事或难耳。

余曰:此当与社友商之。于是复邀同社诸君集议,金推谢君冶盦主其事。冶盦欣然允诺,并指请钱君夔若、章均孙宜、陈君景侯助之,而社中耆硕,如许君颂慈、曹君纶香、顾君骧瑶、章君松盒、滕粟昆仲,均自愿分任校刊。”(祝廷华《江上诗钞跋》)祝氏因获顾季慈后人所赠《江上诗钞》稿本,遂发愿由陶社主持刊印《江上诗钞》,足征识见卓犖,热心地方文献传播。不然,经历后来之社会动乱,稿本一旦遗落,损失遂无法弥补。祝氏为刊印《江上诗钞》,先于祝氏怡园设立书局,拟定刊印及筹款章程,同时物色筹款与校对之人,负责筹款之钱翰五虽不幸物故,承担校对之谢鼎镛则终始其事,凡此亦见祝氏之处事有方,善于识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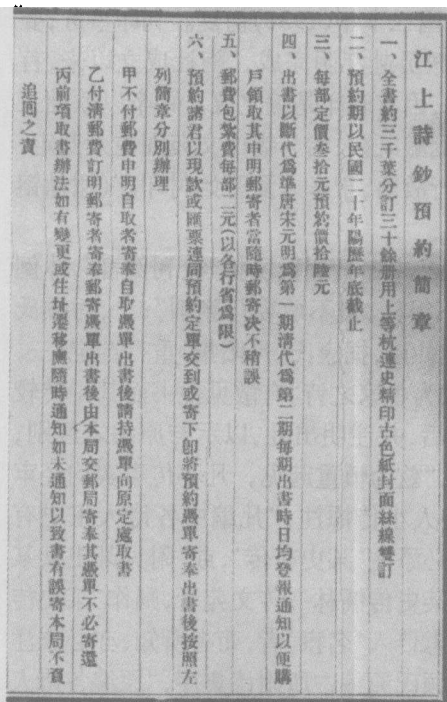
《江上诗钞》刊印,始于民国二十年(1931)初夏。刊印事务,委诸无锡“文苑阁”,由文苑阁派员赴江阴完成,“陶社成立以来,首以诱掖后进、维持诗教为己责,因有刊印是编之议。顾卒以款绌工巨,屡议屡辍,而愿莫之遂。酝酿既久,始与锡山文苑阁主人商定,仿《武英殿丛书》用聚珍板印行故事,于辛未夏开始付印。”(谢鼎镛《江上诗钞跋》)

《江上诗钞》校刊事宜,据辛未冬日谢氏所拟“校刊例言”,体例如下:一,对顾氏原编“非万不得已,概不敢妄行删削”;二,对顾氏原编酌情重选,如邑人宋康胜仲诗,据康氏《丹阳集》重行选定;三,对顾氏原编酌加增补。谢氏以为各家之诗“有散见他书而其诗转较本选为胜者”,遂附录于该人后,并注明出处,以示与原编之区别;四,审核顾氏原编诗人小传,“兹为慎重起见,凡小传事实均经审查,或略有所修正”;五,为诗人小传添注,“凡编中各诗人正史有传,或附见他人传者,小传下必添注‘某史有传’,或‘附见某史某某传’字样。至传儒林者,则作‘某史传儒林’;传文苑者,则作‘某史传文苑’。其筮仕他省,有为方志传入‘名宦’者,苟有所知,亦必添注‘某志传名宦’字样;六,删除顾氏原编中所附诗集序,“原编各诗人之诗,有冠以序者,有不冠以序者,在前人体例中甚属罕见,兹从

删”；七，补足顾氏原编中所删节之诗前小引及同题之诗；八，调整顾氏原编中次序凌乱处；九，校对顾氏原编入选各诗，“凡集有单行本者，以单行本校之；有刊入丛书中者，以丛书本校之；有采自《澄江诗选》、《江阴诗粹》者，则以适园所藏赵曦明手钞本校之。有数见于其它各选本者，则以其它各选本校之。如字有可疑而无从考证者，或从□，或仍其旧，以符‘不知阙如’之例，概未敢妄行臆改”；十，校改之处，详慎考证，字有歧异而皆可从者，则注“一作某”于其下；十一，重编版心诗人姓名，“概行从名，以醒眉目而便检索”。以上各节，均谨慎得当，具见谢氏用心精密，校刊认真。

《江上诗钞》刊印工作，初期进展顺利，不久则因主要筹款人钱

翰五去世，造成经费困难。原先设计发售“预约券”以募集资金之举，亦进展不利(国家图书馆现藏有“江阴陶社印书局”当年所印之“《江上诗钞》预约定单”一种)。“议既定，余与翰五购纸开办，时甚乐观。诂事有不可料者，自辛酉四月八日开始，杀青未及半载，而翰五突然作古，华又以痼疾羁缠，历数月之久，足茧不出门户。时江西产纸区域悉为匪据，纸价翔贵，一月数涨，几逾原价之半，而吾邑凶灾叠告，哀鸿遍野，急待赈济。原议



国家图书馆藏预约定单

发售预约券若干，减收半价，无人过问。至诗人后裔，调查详确，指画凿凿，卒亦无可启齿。甚至登报布告，时逾半载，应者寂然也。廷华此时，大有进退维谷之势，然决不敢半途中止，虽甚窘迫，仍策进行。”（祝廷华《江上诗钞跋》）

经费支绌以外，国难正殷，时局动荡，也使刊印工作几乎停顿，所幸祝氏意志坚定，临危不乱，负责校对之谢氏专心致志，配合有效，工作得以继续推进：“乃至秋冬之间，倭难复作，时局骤变，吾邑地处要塞，祸恐波及，急将已刊十六册先行装订妥放。迨腊尾年头，消息益恶，廷华与冶盦坚持初意，度岁以后，循旧开工。时许颂老已于去秋物故，而社友中又有因事他就者。冶盦疲精劳神，日与钱君夔若伏案校对，不以为苦，而印刷处以受冶盦奖劝，益孜孜工作，出版日多。维时校对益烦，日无暇晷，而冶盦更不言劳。呜呼贤矣！设非冶盦，则此书不成，夫如是而冶盦之功真不朽矣。”（祝廷华《江上诗钞跋》）

为筹集《江上诗钞》刊印缺款，祝氏曾专程赴沪，向同乡募捐，争取经费支持，“若夫经济方面，全书工料，连同局用一切开支，需费甚巨，虽百计罗掘，于事无济。不得已奔走沪上，商得同乡诸公赞助。若薛氏淦生昆仲，若奚氏尊衔叔侄，若葛君凤池，刘君善斋，崔君福庄，夏君季瑜，朱君少鸿，程君厚坤等，靡不慷慨乐输。而最先提倡如马邑尊汉波，夏公使挺哉，亦解囊资助。其它捐户，尚不乏人。嗣刊《续集》，悉数登载，以彰盛德。”（祝廷华《江上诗钞跋》）

《江上诗钞》于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）冬刊印告成，一百七十五卷之钜著，未满二载即获完成，实称幸事。承担《江上诗钞》总校及补续之谢鼎镛，对于祝廷华主持之功亦备加推崇，“筹款之责，由祝丹卿先生及钱君翰五任之，而刊政则属之予。乃开局甫半载，而翰五物故，款由丹卿先生独任。其势乃不得不出之于募捐，募捐不足，乃更鬻书以补助之。先生用心，可谓苦矣。”（谢鼎镛《江上诗钞跋》）

壬申（1932）冬《江上诗钞》刊印完成后，次年（1933）春又继续

《江上诗钞补》十一卷之刊印，“岁壬戌（1922），自赣旋里，以时局日非，爱女留育夭丧，遂无复出山之志，乃取篋中手钞本，稍稍整理，若者续顾氏《江上诗钞》，若者入《江上诗钞补》。……陶社成立，同人提议刊印《江上诗钞》，社长祝丹卿吏部主持尤力，余乃复从事编辑，以竟曩昔未竟之功。亲故有知其事者，间或录送先人诗稿，坚请纂入。余体仁人孝子之用心，凡其诗稍有可存，即不忍加以拒绝。久而久之，得诗一百六十九家，共十一卷。书成，呈之吏部，时刊《江上诗钞》将竟，乃即以是编付刊，并嘱迅将《续江上诗钞》脱稿，以便明春续梓，勿以日久而厌生，勿以款绌而气馁，情长语重，反复叮咛。昔人谓梓人遗诗，胜于埋骨掩骼，才魂有知，不必感余之广为搜罗，而当感吏部之勇于负责也。”（谢鼎镛《江上诗钞跋》）未久，《江上诗钞补》刊印成书。《江上诗钞续》则功亏一篑，未及付印。祝、谢二氏之精诚合作，是《江上诗钞》刊成之保证，两位江阴先贤苦心保存地方文献之功绩，足为今人铭记。

民国学者夏孙桐赞誉《江上诗钞》刊印之事云：“延陵旧乡，千余年来，名卿硕儒，文人逸士，同留光气于斯编。从此传布人间，有功于一邑甚巨。昔顾侠君选《元诗》成，梦衣冠而拜者甚众。不独（顾）心求先生编辑盛心，宜有此感应；诸君印行之功，与编辑之功同垂不朽矣。”（夏孙桐《江上诗钞序》序）《江上诗钞》编成后七十年，经陶社诸君之努力终获刊印成书；《江上诗钞》刊印后七十年，经江阴地方有识之士之倡导又获重印。江阴暨阳名贤院诸君热心乡邦文化事业之愿力，足与陶社诸贤相媲美而造福桑梓于无穷矣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复旦大学图书馆